

连城党史資料

第四輯

中共连城县委党史資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編

连城党史资料

第四辑

中共连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

商人要使商業發展，
 只有贊助土
 地革命，
 農村經濟
 發展，加增農民
 的購買力。
 紅廿一軍

勇敢覺悟的青
 年加入共產青
 年團來。
 紅廿一軍政
 青年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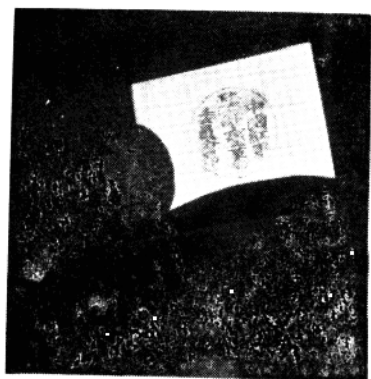
一九三〇年，紅

二十一軍寫在賴

源上村的宣傳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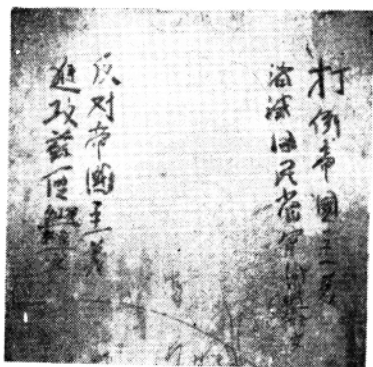
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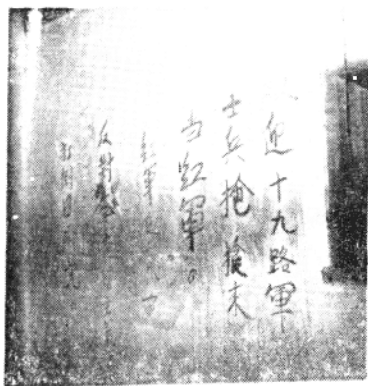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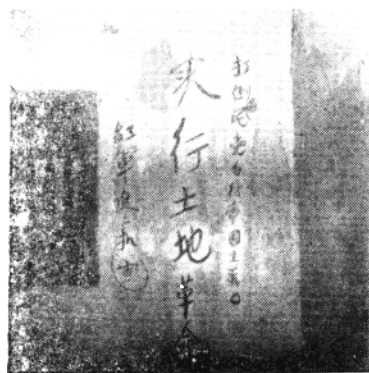
AWC/1928/16



△一九三〇年七月，红二十一军在姑田帮助建立了上堡、中堡、下堡革命委员会，上为“中国红军政治部上堡革命委员会印”（原物）

一九三〇年，新泉红军在文川上砾村帮助成立苏维埃政府时写在驻地的标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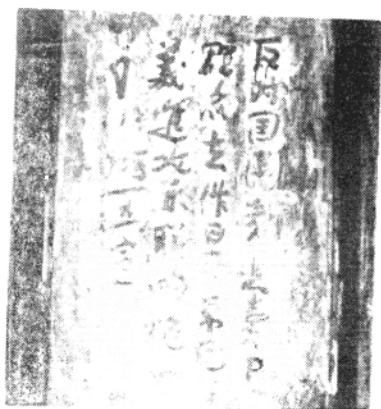
红军一〇一团写在四堡

双泉村的宣传标语



△红军一〇一团画在四堡双泉村墙壁上的
漫画(局部)

一九三四年七月“抗
日先遣队”写在塘前
水源村的宣传标语▷



目 录

连城县姑田镇早期革命斗争的回忆……………余升云（1）

红九军团护送红七军团渡过闽江北上抗日的经过

……………黄火青（6）

在苏区……………刘 晓（9）

杨佛园同志谈早期革命情况……………（18）

李招顺回忆苏区少先队活动片断……………（23）

艰险的历程

——回忆三年游击战（续）……………李德安（27）

连城人民革命斗争大事记

……………中共连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91）

连城县姑田镇

早期革命斗争的回忆

余 升 云

这个材料是根据我个人的回忆和当时的一些亲身经历写的关于姑田镇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四年期间的农民运动和我党活动的一些情况，没有任何参考材料，若有误差，请谅解。

一、在大革命开始：1925年——1927年这两年中，我们党在姑田镇和上、下余的活动主要是宣传和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协会在这两年中比较活跃。我记得姑田镇上堡的江勇珍同志和上余尧家畲的余水翁两位同志从广州回到姑田后，就在姑田镇广泛宣传农民协会的主张。农民协会主张免租、免税、免债、免钱粮，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反对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这两位同志在姑田一带是有名的人物，当地不少人一提起这两位同志都情不自禁地伸出大拇指称赞他们是“好样的”。广大农民和他们的来往越来越多，如：上余尧家畲的余齐公、山桐林画画的余××（名字忘记

了)、大洋塘我的父亲余芳元、寒林的余芳申、洋地凹的花子鬼、鼓楼楼的狗古(大名不知)、下余上坪的余齐永、下坪的余齐福、余齐合等,这些人经常与余水翁和江勇珍来往。江勇珍还经常到我家和寒林的余芳申谈话,有时也到余芳申家。他们经常在我家和我父亲谈话,有时还住在我家里,并吩咐我说,“大人谈什么你们小孩不能随便听,听了也不要随便讲,不准乱讲”。这样吩咐我的是余芳申、花子鬼和我父亲,他们对我说得最多,至今想起来还在耳边回响。他们谈话我也不大懂,那时我十五、六岁。但江勇珍同志给我印象很深,他大概二十八、九岁,是一个念书人,待人和气,和别人说话时脸上总带着笑容,农民都很爱和他接近。

二、1926年冬和1927年春之间,姑田镇和上下余的农民运动:当时一千余人在姑田镇大板山开大会,上、下余二百余人在上坪开会,然后与姑田的一千余人会合同去打清流的陈庆鸿(陈是清流和连城之间的溪源一家最大的地主),那时国民革命军也经常在姑田经过,农民趁此机会去打的。当时群众的革命热情是很高的。人们手持着梭标和木棍,当时的领导是江勇珍和余水翁、余齐公同志。但由于没有经验单凭革命热情和阶级仇恨去打,结果陈庆鸿和清流县民团勾结联合防守,把农民队伍打散了。从那以后,清流和连城的反动统治集团联合起来对姑田,上、下余农民运动进行镇压。连城民团一百多人进驻上坪、清流县的民团一百多人进驻大洋塘、寒林、洋地凹(都是上余的)一带。两个县

的民团二、三百人，来回进山围剿，这样围剿了一个多星期。当地粮食吃光就派人到姑田、溪源、罗坊去担谷子。那时余水翁、余齐公、余芳申、余齐勇都进入深山老林去躲藏。在两个县的民团围剿后，每过一个月左右，就又有二、三十个兵经常来抓余水翁、余齐公、余芳申等同志。那时老百姓也就经常逃走、躲避。经过围剿后，连城县和清流县下令禁止农民活动。以后，农民运动也就慢慢地消失了，农民之间的互相来往也就少了。余水翁有时晚上来和我父亲、余芳申个别谈话，声音也不象公开活动时那样大声，而是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到，我们小孩根本就不准坐在跟前。他们大部分活动都在夜间，在一起谈话也只有三、四个人，顶多谈一个多小时就各走各的。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晚上余水翁、余齐福、余芳申、花子鬼都到我家，在父亲住的房间里谈话，声音很小，余芳申在家门口站着，他们谈完话，余芳申也就走了，当时我感到很奇怪，以前他们都是白天来的，为什么现在要晚上来呢？并且把我支走了，这种活动持续了一年左右。

三、开始大屠杀：1927年冬，有一天传来不幸的消息，从大洋塘到姑田赶集回来的人一进村就大声说余水翁在姑田大板山被枪毙了，这时有不少人感到可惜，也感到非常恐惧和害怕，我父亲和余芳申也显得有点坐立不安。互相你看我我看你什么话也不说。又传来消息说山桐林余××（名字忘记）在姑田不见了，找了好几天都找不到，后来发现在城兜四十几里的溪潭里用猪笼装着淹死了。最难忘是有一天

我们几个人挑竹丝到郭坑，我拿了脚钱，就到姑田坎兜街去买东西。还没买完就听见吵吵嚷嚷的说大板山又枪毙了七、八个人，我们听到这情况就赶快往回跑。不久又听到余芳仁从龙岩州回到姑田被华仰桥反动民团扣压了，不几天也被枪毙了（在城兜以南××庙门前），总之，在二七年秋冬至二八年春夏期间姑田大板山经常杀人，具体数目我不知道，但听说的起码有几十人，还有在别地抓来杀的也不少。所以那时在华仰桥反动民团黑暗的统治下，是杀人最多最厉害的时期。而且在连城、清流、永安、小陶都有杀人的消息传来。他们杀人都是以杀“土匪”为名的，那时土匪确实不少，但他们杀的都是受人民群众称赞和欢迎的好人，真正的土匪一个也没有。对真正的土匪他们是采取收编归顺的策略，一归顺就当民团，土匪头给他一个官当，所以他们剿匪是假，镇压革命是真的。在大板山被杀的全都是我们的同志和革命群众，江勇珍、余水翁都是优秀的进步青年，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没有他们英勇的牺牲，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四、准备暴动：姑田的革命群众是不会被压倒的，敌人杀人越凶狠，就越激发群众的斗争情绪，人们认识到反动统治者最怕的是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虽然余水翁、江勇珍被杀害，但更多的人觉悟了，农民队伍更发展壮大。自江勇珍同志被杀后，姑田镇党的领导人是谁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上、下余党的领导人是余齐公、余芳申，我父亲当时到底是什么人物我不知道，但我认定他起码也是骨干力量。当时余齐公、还有我父亲、余芳元也常去余芳申家，大都是半夜去。

一九二八年冬，天气很冷，一天，余芳申到我家找我父亲，说到上坪去。（他们原定在姑田镇举行联合暴动）。我们到上坪祖祠集合，我记得当时有余齐公、余齐福、余齐合、余芳申、花子鬼、狗古、余齐勇等，还有几个我不认识。余齐公讲话，正讲着，一个人满头大汗跑来，把余齐公拉到门外说什么，余齐公进来长嘘了一口气说，我们姑田起义的总领导人被华仰桥杀了，这次起义被叛徒告密了。余齐公说大家快回去吧，注意保密，等红军来了就当红军去吧。过了两天，余齐公到余芳申家（我父亲也在）余齐公说我要到姑田去了解一下，当时余芳申就让我跟着余齐公去，我们到了坎兜街“行春号”店呆了一会，就到马面下去（即中堡街），我离余齐公十几米远，余齐公一到马面下街口就被反动民团抓去了。我当即赶快就跑回家来报信。

一九二九年春夏，红军第四军打到姑田来了，我们参加农民起义的骨干差不多都参加了红军。当时同我一起参军的有余齐福、余齐合、余齐勇、余狗古等。这就是我所了解的姑田革命斗争史的一些片段，这段历史还有其它同志可以补充，我参加红军以后，有什么变化我就知道了。我仅根据我个人的回忆实事求是地写了这段历史，对于整个连城党的活动和斗争历史我是不了解的，我只知道姑田和上下余的一些情况。当然事隔快60年了，有可能有记错和不清楚的地方，请你们提出批评指正。

余升云 1985年7月31日

注：本文作者系连城姑田上余村人，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四军，离休前是北京军区海军后勤供给部政委。

红九军团护送红七军团 渡过闽江北上抗日的经过

黄 火 青

红九军团执行护送任务，是在广昌大会战之后，我军团实际只有一个师的军力，约四千多人。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后，七军团军长寻淮州、政委乐少华、参谋长栗裕等同志来我军驻地广昌南新安镇，研究了战斗行动计划，规定我军在七军团后交错前进。我们随即召开排长以上的动员大会，宣传掩护七军团北上抗日的光荣任务。七月七日整装出发，经铎前、石城、宁化、清流、到小陶、嵩口。此时七军团已将永安城包围。我军经安沙，接七军团包围永安任务。当时有一团敌军，消灭该敌，占领县城，不是什么困难任务，但怕拖延时间影响渡江，所以虚张声势，实际不让他阻碍我们前进。对卢兴邦的老巢尤溪也是如此办理，我军撤永安之围，经西洋、桃源、兰坑、龙门，到达尤溪又经十四都于八月一日占领闽江沿岸重镇樟湖坂。红七军团在尤溪以东已顺利地渡过闽江，占领黄田、水口二镇。我军即以樟湖坂为中心，

沿江上下展开，占领尤溪口、南源、十四都等地，以保证七军团继续前进。该军过江之后，一举击溃了敌人王敬久部，于八月七日占领罗源县，并向浙江方向前去，我军掩护任务至此胜利完成。同时，我军在尤溪口缴获黄色炸药三万多斤，食盐五万多斤，和许多军用物资。又截获了自福州开来的一隻船，上载土烟二十多箱，布匹商品数十箱，消灭了小股守护的敌人。我军进入白区（敌统区）后，全军动员做群众工作，宣传抗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实行土地革命等口号。从永安属之西洋，到闽江畔樟湖坂，到处有群众挂小旗欢迎我军，特别是樟湖坂的群众表现热情，商店照常营业，行人熙熙攘攘。在樟湖坂召开了庆祝南昌起义七周年的大会，把没收来的反动派物资尽量的散发给群众，整整在那里驻了十天，部队也进行了大休整，改善生活，情绪高涨。又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将所缴获的炸药、食盐全部运回苏区（当时苏区食盐是一块现洋一两）从军团首长起每人背三十五斤，每匹乘马驮二百斤，战士们三个人轮流担两担，或四个人挑三担，全军组成了浩浩荡荡的运输大队。好在沿途无重大敌情，不管天气怎么炎热，山怎么高，路怎么险，个个精神旺盛，一心要完成任务。返回路线基本是原道，只在高才圩、仙樟、大田、温泉、石峰向东绕了一些。大田几百民团，闻风而逃。这时接到中央电报，派了部队和民工数千人，到连城的朋口来接运。消息传开，苏区已近在咫尺，疲劳顿然消逝，脸上都显露出了无限的胜利喜悦。八月二十八日，到了姑田，休息一天，整顿军容，准备回家见亲人。一

进苏区，战士们蜂拥般的奔向苏区邮局，把自己带的一小包一小包食盐作为礼物寄回家中。红九军团这次深入敌人统治区，历时五十天，来往行程一千八百余里，胜利完成中央军委交给的军事的经济的两大任务，我军称之为东线行动，经常为大家所津津乐道。七军团原属赣东北苏区的建制，来中央苏区进行补充整顿后，以抗日先遣队名义，渡过闽江，归还建制，从未听到评价此举的得失问题。我想即如七军团留在中央苏区，在中央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下，也挽救不了严重的历史性挫败。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

摘自《福建党史通讯》1985年第7期

在 苏 区

刘 晓

我在一九三二年二月，离开上海到苏区工作。一九三三年一月，潘汉年也到苏区来了。

一九三一年六月，我第二次被捕。事先，中央特科已发警报说我们已被敌人注意上了。省委秘书处负责交通工作的彭寿仁在华德旅馆开了房间，并把他的母亲和弟弟接去做掩护。我约了人在那里接头。一天，当我走进旅馆，就被包打听逮住，那时彭寿仁已被捕，后来的王稼祥、张平也同时被捕。原来，彭寿仁将宣传品和《红旗周报》放在枕头底下，正好被查房间的包打听搜到。我们一行四人先被解到公安局，后被解到警备司令部，虽然受尽重刑，但四人的口供前后一致，咬定互不相识。敌人没有抓到什么证据，无法判决。在龙华狱中，我经过中央特科的介绍，参加了党支部委员会，支部书记是谢宣渠、张明（即陈为人）和我是支委。这个支部是狱中几个支部中的一个。在狱中，我碰到刘鼎和关向应等同志。因为关向应没有暴露，支部决定特别加以保护，使他很快得到释放。后来，组织上花了一笔钱，由蔡叔厚买通了警备司令部里的关节，将我交保释放。我出狱后住在卡德路

卡德旅馆，先是熊志华来接关系，接着陈云找我谈话，分配我到苏区工作。一九三二年二月，熊志华陪送丁柏林、陈琮英和我从上海到汕头，再到永定进入福建苏区。

一九三二年三月，福建苏区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闽粤赣边临时省委改称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是罗明，我担任省委的常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李明光，秘书长是肖向荣。成立福建省苏维埃，主席是张鼎丞。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纠集了六十三万兵力，疯狂地向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从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三月，敌人以全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中央主力红军迅速转到广昌、宁都一带，闽西的红十二军和独立第七师奉命调往江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驻漳州的十九路军向闽西苏区进犯。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宁都会议后、虽然将毛泽东调去做政府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但是，这时第三次“左”倾错误还没有完全贯彻到红军的领导机关，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指挥下，仍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作战，采取声东击西、大兵团的伏击和集中优势兵力坚决围歼的作战方针，在黄陂、车陂战役中歼敌近三个师。在福建，罗明召开省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谭震林、李明光、郭滴人、李坚贞和我，会议决定贯彻毛泽东的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的作战思想。由罗明任特派员去上杭、永定、龙岩一带发动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在罗明离开期间，由我主持